

# 边缘的跋涉

## ——《民族文学研究》理论探讨类论文 30 年轨迹寻踪

马梅萍(回族)

**内容提要:** 作为民族文学研究的阵地,《民族文学研究》上刊发的理论探讨类论文隐含着刊物的思路、导向、转变信息,引领着民族文学研究的航向,研究这类论文有助于了解民族文学研究的具体情况 & 发展轨迹。故文章结合具体语境,在 30 年的历时性坐标中对之进行寻踪分析:1980 年代“少数民族文学史笔谈”栏目和相关概念论争较为突出,具有国家统辖下的政治性特点;1990 年代论文数量剧减并逐步去政治化,反映了刊物在社会转型期的文化适应;新世纪的多元语境开拓了学术空间,跨界研究法的运用及“创建‘多民族文学史观’笔谈”等栏目的开创使研究逐步深入。

**关键词:** 文艺理论 民族文学 文学史 学术史

### 引子:岁月流变中的《民族文学研究》面相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作为国家建构工程的民族问题就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1950 年代,声势浩大的“民族识别”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中国各民族的名称、数目在“民族识别”工作中相继被确定下来。“正是当年的‘民族识别’工作使我国建立起了一个‘民族身份’与族群关系的整体性框架,并把它制度化”<sup>①</sup>。接下来,在国家意识建构的内因驱动下,书写总括 56 个民族的文学状况的中国文学史被顺理成章地摆上议事日程。由于少数民族大多民间口传文学发达而不擅书面记载,在书写国家文学史时存在资料不足的情况,故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共中央宣传部即组织对少数民族民间文学遗产的搜集、整理工作和对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编写工作。上世纪 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初,出现了少数民族文学史书写的第一次高潮,中经“文革”停滞 10 年,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涌现出第二次书写高潮。《民族文

<sup>①</sup> 马戎:《中国民族史和中华共同文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年,第 132 页。

学研究》正是在此背景下创刊,“文革”后,为配合民族文学史写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以下简称民文所)和《民族文学》《民族文学研究》应运而生,“从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的创立和1983年《民族文学研究》的创刊算起,它们的出现是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在国家学术体制和教育体制中正式确立的标志”。<sup>①</sup>

1983年,《民族文学研究》在民文所主持下创刊,刊物最初为季刊,1986年改双月刊,1990年改回季刊,2011年复改双月刊。创刊至1994年第3期为止刊物上没有列出编委,1994年编委会改组,第4期始公布编委姓名。首次公布的19位编委中多数是民文所研究人员,其中少数民族11人,这些编委的少数民族与研究者双重身份兼顾了刊物的民族性与学术性定位。2001年与2013年,刊物分别进行过两次大幅度的编委调整,从一个侧面显示了民族文学研究人才的代际更替。栏目设置方面,《民族文学研究》30年间也有一些变化,创刊号至1985年的期刊目录上没有列出栏目,不同类型的论文之间只用一条简单的横线隔开,风格相当朴素。1986年开始设置栏目,2010年第2期起不再设置。刊物每期栏目多少会有变化,但总体变化不大,“民间文学论坛”、“理论与思考”、“古典文学研究”、“现当代作家作品评论”、“国外研究之窗”是几个相对固定的栏目,有时会机动增加专题研究、学术动态、书评、书讯等栏目。历经30年的岁月沧桑,《民族文学研究》在逐步深化学术性的前提下始终坚持以民族性本位为核心的办刊宗旨: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与思想方法,贯彻党的“双百”方针和民族政策,以严格的学术标准,选择刊发有关我国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专题论文、调查报告和文学资料等。<sup>②</sup>

作为刊发民族文学研究学术论文的专刊,《民族文学研究》对于研究中国多民族文学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创刊以来30年间中国民族文学研究的问题、热点、不足、进程、转变等重要信息多可在此寻到踪迹。其中,理论探讨类论文提供的信息最明显,这类文章在一定程度上隐含着刊物的思路导向。故而,笔者以《民族文学研究》30年间刊发的理论探讨类论文为研究对象,希望通过对它的爬梳来分析刊物的变化及其暗示的相关民族文学研究信息。为

① 梁庭望、汪立珍、尹晓琳主编《中国民族文学研究60年》,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28页。

② 1983年创刊号上公布的创刊宗旨为: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贯彻党的“双百”方针和民族政策,刊登有关我国各少数民族文学的各种专题论文、调查报告和重要的文献资料等,为繁荣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事业,为增进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交流贡献力量。文字来源见《民族文学研究》创刊号“编后记”。1994年编委会改组,没有明确标示办刊宗旨,但提出“办成高品位的国家级的学术刊物的既定目标”,见《〈民族文学研究〉编委会改组并召开编委会工作会议》,《民族文学研究》1994年第4期。《民族文学研究》创刊30年,其办刊宗旨总会随时代有所更改,故文中所引办刊宗旨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网站上现在公布的办刊宗旨。

方便分析历时性轨迹,笔者分别从 1980 年代、1990 年代、新世纪三个时段加以区分。当然,这只是个笼统的分期法,之所以划分 XX 年代,也只是为了把刊物的成长、变迁与特定的时代语境联系起来,至于三个时段中明显转变的关键点,则会在下文分析中提到。

### 1980 年代:国家话语统辖下的学科奠基

自 1983 年创刊到 1988 年左右,如新生的婴儿般,《民族文学研究》在一步步的摸索中逐渐稳定成型,可以说这一时段是刊物的奠基期,同时也是“民族文学研究”这门学科的奠基期。此时段内共刊发理论探讨类文章七十多篇,这类文章在 1985 年前具有明显的政治气息,1986 年后逐渐淡化;1986 年后,“理论与思考”、“文学史学术探讨”等理论探讨专栏的开设,标志着刊物脱离初创期的探索,开始步入正轨。要而言之,1980 年代的理论类文章具有以下特质:

#### (一)具有国家统辖下的明显政治性

《民族文学研究》的创刊起因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故而在创刊之初政治意味浓郁。1983 年到 1984 年发表的理论探讨文章共 17 篇,其中政治性强的有 8 篇,就数量而言,还是比较多的。<sup>①</sup>这类文章以转发领导发言或传达会议精神为主,占据的都是刊物头版或头栏的位置,暗示的意义不言而喻。如创刊号头版刊发《一项开创性的事业——周扬同志谈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转达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就《民族文学研究》创刊问题的讲话,强调:“各个少数民族的精神财富,不仅属于本民族,并且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1984 年第 1 期《贺敬之同志关于召开史诗学术讨论会的谈话》认为:“加强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工作,不仅是为了促进少数民族文学事业本身的发展,而且从政治上讲也有重要意义。它可以提高我们多民族国家人民的自豪感,增进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和相互团结。”周扬、贺敬之的官方发言人身份决定他们的讲话必然是国家意志的转达,周扬突出民族个体对于国家主体的归属,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纳入国家学术的范畴,贺敬之更明确指出民族文学研究在促进民族团结方面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二人讲话的背后,是国家话语对民族文学研究合法性的定位:民族文学研究对促进国家一体化、体现平等团结的民族政策具有现实的政治意义。1982 年 2 月,

<sup>①</sup> 关于 1983 年至 1984 年政治意味比较明显的理论类文章统计如下。创刊号三篇:包括《一项开创性的事业——周扬同志谈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荒煤的《祝贺与期望》、李一氓的《在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84 年第 1 期三篇:包括本刊编辑部的《清除精神污染 发展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贺敬之同志关于召开史诗学术讨论会的谈话》、王平凡的《史诗研究要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1984 年第 2 期一篇:梁一孺的《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文学的思想》;1984 年第 3 期一篇,即《中宣部发出关于加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资料搜集工作的通知》。

中宣部发出“红头文件”《关于加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资料搜集工作的通知》,《民族文学研究》1984年第三期刊发《中宣部发出关于加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资料搜集工作的通知》传达通知精神,明白无误地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纳入国家工作部署。而刊物本身也将响应政策作为最初的办刊理念之一,如时任民文所所长的王平凡提出,“在我们科研工作中,既要注意科学性,又要注意政策性。”<sup>①</sup>1986年后很少再有政策指导性文章出现,这与80年代中期的观念解放有关,也与当时“国家对经济、文化活动控制的范围和有效性相对减弱”<sup>②</sup>的文化格局有关。

客观而言,少数民族文学资料散佚普遍,口头传统濒临消失,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也起步很晚,单凭个人的能力就连搜集资料都困难重重。新中国成立之初及“文革”后,正是国家的有力干预才保障了民族文学与民族文学研究工作的开创、发展。

## (二) 围绕着相关概念的讨论反映了民族文学研究学科奠基期的艰难

一门新学科的建立必然会面临划定范畴、厘清概念、架构理论等种种繁复的工作,作为一门跨文化跨学科的边缘学科,民族文学研究局面的开创可谓步履维艰。虽说在第一拨民族文学史书写的浪潮中已有相关问题与观点的提出,但作为一门学科,民族文学研究是1980年代才正式建立的,就起步来说与新中国建立后即兴建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相比整整晚了30年;研究者基本局限为民文所、各民族院校及各省民文所研究人员,就人数而言力量薄弱;研究资料稀缺,没有现成的资料库,最早的一批研究者多是在参与搜集、整理民族文学资料的过程中接触到第一手资料,然后才摸索着进入这一领域。研究对象的复杂无形中也决定了研究工作的艰难。55个少数民族文化各异,许多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与文字,其原生态的文学创作也势必以民族语文为载体,各具特殊的地方性特色,对之做宏观研究是相当有挑战性的。

故而,《民族文学研究》始创即面临着重重困难,仅是确定民族文学这一研究对象的内涵外延及厘清学科基本概念就已很棘手,更遑论高屋建瓴地构架民族文学研究理论体系。这种艰难探索在该刊关于民族文学概念与特征的相关争鸣文章中即可管窥一斑。

创刊号共发表理论探讨类文章六篇,其中四篇为相关领导讲话,剩下两篇也无涉民族文学概念厘定。一般来说,创刊号起码要解决办刊方针与研究对象界定的问题,毕竟“民族文学理论的基础之基础,是对民族文学范畴的确定”<sup>③</sup>;但《民族文学研究》创刊号并没有解决民族

① 王平凡:《开创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新局面——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第二届年会上的发言》,《民族文学研究》1983年创刊号。

②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35页。

③ 朝戈金:《民族文学范畴之我见》,《民族文学研究》1987年第2期。

文学的对象界定问题,与同期刊登的多篇具体分析民间文学作品的论文相比,理论建设显然是滞后的。浓厚的政治使命感使得刊物与学科的创办更像一个政治任务,当然,这也是体制化时代国家学术的共同特色。

1984 年第 2 期刊发黄铁的《民族文学研究刍议》初涉对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的表述,第 3 期孟和吉雅的《谈民族文学的划分依据》、邓敏文的《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学的主要特征》、扎拉嘎的《文学的民族性与新时期的少数民族文学》、魏泉鸣的《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建设中的几个问题》等一组文章才正式讨论民族文学的概念及学科范畴,1986 年第 1 期发表进铨的《少数民族文学界定刍议》也参与到这一讨论行列。邓敏文以民族语言为界定民族文学的标准,孟和吉雅提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标准,扎拉嘎认为民族文学应具备民族审美理想、民族语言、民族题材等要素,魏泉鸣认为汉族以外的文学就是少数民族文学。这几篇论文各持己见,可见对于研究对象的界定,刊物还没有形成相对成熟的观点。正如编后记所言,“本期发表的这类文章也各属一家之言。从目前情况看,讨论各方意见分歧比较大,要在这两个相关而又有区别的理论课题上取得比较一致的观点,还尚需时间。”<sup>①</sup>

关于民族文学的划分标准在第一拨少数民族文学史书写浪潮中就困惑着研究者,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又引发热烈讨论,按理《民族文学研究》应对讨论进程进行回溯与追踪,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考量这一现象,并提出刊物对民族文学概念的成熟界定。但这一任务显然没有及时完成,就数量来说,这类论文选文过少,尚没形成一种争鸣的气氛;刊物也没有对之进行理论研究,明确提出自己的立场,致使研究对象有些含混。直到 1986 年第 6 期南芳思的《中国民族文学研究概况》与 1998 年第 2 期朝戈金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概念、对象和范围》两篇文章的刊发才算是给了一个迟来的答复。南芳思简单梳理了关于民族文学划分标准的各种意见,朝戈金在此基础上将民族文学概念界定为少数民族的文学现象。<sup>②</sup>《民族文学研究》对研究对象界定的滞后充分说明了创刊之初学科建构步伐的艰难。

除此之外,1980 年代还探讨了民族文学的民族性、现代性、审美特质、时代感等问题。正是在第一代研究者披荆斩棘的艰辛开垦中,民族文学研究的相关理论才逐步浮出地表。

### (三) 聚焦于同一化规约下的少数民族文学史书写笔谈格外突出

十七年时期民族文学史书写作为国家学术很受重视,1958 年 7 月 17 日第一次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座谈会在中宣部领导下召开,规划了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写作蓝图。第二

<sup>①</sup> 《编后记》,《民族文学研究》1984 年第 3 期。

<sup>②</sup> 对民族文学概念论争进行简单梳理并持以作家族属为划分依据观点的还有一些研究专著。如吴重阳《中国当代民族文学概观》,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6 年;李鸿然《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4 年;梁庭望、汪立珍、尹晓琳主编的《中国民族文学研究六十年》。

次座谈会紧接着于1960年9月召开,民族文学史书写的第一批成果随之涌现,有9个民族先后于1960年8月前写出了本民族的文学史或文学简史初稿。“文革”结束后,第三次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座谈会于1979年2月召开,恢复了民族文学史的书写工作,又有十余部单一民族文学史以及毛星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相继出版。1984年11月2日至6日,第四次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继续推进民族文学史书写工作。中宣部、中国社科院、国家民委、文化部于次年6月29日联合下发《关于转发〈1984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要求各地领导部门积极支持民族文学史的编纂工作。<sup>①</sup>

《民族文学研究》创刊后,促进民族文学史书写的使命责无旁贷地落到了其肩上,作为对会议精神的实践响应,刊物自1985年至1987年曾先后设“文学史编写工作交流”、“文学研究十年”、“文学史学术探讨”等栏目,刊发了17篇少数民族文学史笔谈论文,具体谈论了白、蒙、瑶、壮、藏、侗、傣等各族以及其他跨境、跨国民族文学史的书写情况。这些论文基本由参与编写各民族文学史书写工作的研究人员撰写,大致涉及到三个方面。第一,对本民族文学史宏观体例与主要内容的论说;第二,对编写经验的表达;第三,对编写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的提出。其中,文学史的断代、分期是始终困扰编写者的普遍问题,如发表于1986年第5期的《〈侗族文学史〉编写中提出的几个问题》《编写壮族文学史以什么为主线》《傣族文学作品的断代系年问题》等几篇文章都曾提到。各民族文化、文学发展状况殊异,有的民族直到1949年前都一直以民间文学为主体,作家文学并不发达,故而其文学史确实不能简单沿袭社会历史分期法或主流汉文学史分期法。这些问题的提出可以促使编撰者在相互交流的基础上深入思考,也给后续的其他民族的文学史书写提供了借鉴经验。

另外,因民族文学史写作工作重启之时,“文革”结束初期政治规约的余音仍然袅袅,所以适逢其时的民族文学史创作及笔谈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规约下的同一化气息,“其中体现着明显的国家权力意志”。<sup>②</sup>实际上还一时难以实现“多样化,不拘一格的原则”。<sup>③</sup>如关于实事求是路线的问题即是如此。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进一步肯定了这一路线。而民文所所长王平凡在“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座谈会”上提到:“我们要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

① 关于四次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座谈会、民族文学史编写具体情况以及《关于转发〈1984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详情,可参考邓敏文的《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12~26页。

② 李翠芳:《学术诉求与少数民族文学的经典化——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少数民族文学史著作作为研究对象》,《扬子江评论》2012年第3期。

③ 张文勋:《努力提高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的科学性》,《民族文学研究》1985年第1期。

引下,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继续清除‘左’的思想影响”。<sup>①</sup>发表于《民族文学研究》1985 年第 2 期的《认真贯彻实事求是的科学原则 努力揭示白族文学的发展规律》《编写〈蒙古族文学简史〉的体会和认识》《论〈壮族文学史〉的体例问题》等论文都提到修订本对于实事求是思想的落实,从中即可见出时代话语影响下的同一化倾向。

### 1990 年代:社会转型期的文化适应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社会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转型期,“随着商品意识向政治、文化领域的渗透和扩张,社会体制和文化体制面临着全面的‘转轨’”。<sup>②</sup>学术研究也逐渐挣脱体制辖制,由国家学术向个体化、学院化过渡。在此时及接下来的 1990 年代,《民族文学研究》同样在思考的阵痛中实现转变,逐渐进入文化适应期。

自 1989 年起,《民族文学研究》理论探讨类文章就流露出明显的转变气息。《扩宽视角 深层开凿——对民族文学研究的新期待》提出“活跃理论思维,扩宽研究视角,向着学术领域的深层开凿。这是《民族文学研究》办刊人对我们的学科发展的良好祝愿。”<sup>③</sup>这篇文章在总结既有民族文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倡观念、方法、办刊意愿的革新,本刊评论员的非个人化署名更明确发出了刊物转变的声音。1989 年第 2 期的《多元格局中的自由抉择——论民族文学视野的新变》及第 4 期的《期待于民族文学研究的》也与此呼应。这几篇文章中反复出现的“新”一定程度上标志了社会转型期刊物思想的转变,而之后的理论探讨类文章也确实在探索新的学术空间,刊物开始进入 1990 年代的文化适应期,并具以下特点:

#### (一) 论文数量剧减,流露出刊物在社会转型期的踟蹰心理与调适态度

该时段内的理论探讨类论文近四十篇,如果去除 15 篇少数民族古典文论的论文,剩下综合探讨的文章也就二十余篇,就数量而言无疑是很少的。1990 年与 1995 年两年数量为零,1992 年除去“古文论探讨”专栏的几篇文章之外也无纯理论论文。

这就令人顿生疑窦,为什么在创刊至 1988 年的探索阶段,短短六年就有七十多篇理论探讨论文,而在此后刊物已正常运转的十一年间却仅产生了二十余篇此类文章?结合该刊创刊之初的操作模式及 1990 年代的时代语境即可探出个中原因。《民族文学研究》办刊的最初目的是为了配合少数民族文学史的书写,进而同构包含 56 个民族文学的中华文学史,从文学意识层面回应 56 个民族共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代“民族—国家”政治模式。如前所述,两拨民族文学史材料的搜集、整理及写作工作的展开都是国家通过行政指令的方式部署的,

① 《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民族文学研究》1985 年第 1 期。

② 孟繁华、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第二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287 页。

③ 本刊评论员:《扩宽视角 深层开凿——对民族文学研究的新期待》,《民族文学研究》1989 年第 1 期。

这成为民族文学史最初的生成方式。刊物的操作模式也因国家权力的介入而呈现出计划经济时代的被动管理特色。而到了1980年代中后期,商品化潮流渐露苗头,文学与政治的紧密关系开始松动。尤其是在1992年后,中国的社会语境明确由计划经济转向商品经济,骤然脱离国家规划的文学出于惯性一时难免茫然,诚如有的学者所说,“90年代初的中国文化处于一种茫然的空场时期”,<sup>①</sup>民族文学研究亦然。故1990年代《民族文学研究》理论探讨文章的剧减,恰好反映了刊物从国家计划管理向自主发展的模式过渡时的迷茫心态与调适态度。

在理论探讨论文的走势上也可看出这种印痕。如1989年理论论文有8篇,标识了刊物转变研究思路的动机。但接下来的四年中,1990年与1992年均无纯民族文学理论探讨类论文,1991年与1993年的也只各有3篇,此处的相对停顿流露了刊物的踟蹰心理。1994年刊物重组编委会,并明确了办刊意向与具体思路:“把它办成高品位的国家级的学术刊物的既定目标,不应该有任何松动和变更……重视少数民族文学的多学科研究价值,以文学研究为基点和主体,增加跨学科研讨的思维力度。”<sup>②</sup>同时,刊物也开始设置“文学史建设”栏目,力求从宏观学术角度来研究少数民族综合文学史及文学理论。由此可见,刊物已走出茫然,做出了社会转型期的文化适应决策。

## (二)逐步去政治化,实现向学术层面的过渡

《民族文学研究》创刊之初的政治性在学术个体化的1990年代逐渐消隐,体现在刊物刊发文章方面主要就是政策指令性文章或主管部门领导讲话不再出现,思想上的积极性及对具体会议精神的响应也不再被刻意强调,理论探讨论文开始更多从学术层面对研究对象进行总结。正是有该时段从政治化向学术化的过渡,才会迎来新世纪在学术层面大力提升的良好态势。

虽说在刊物初创的前几年也曾对民族文学的概念、特质等基本问题进行过探讨,但相对来说不够深入,民族文学创作及研究中还有许多具体问题并未涉及,对研究对象做宏观研究的学术论文也比较欠缺。1990年代,涉及到民族文学的创作语言、多元文化背景、地域差异等问题的论文相继在刊物上出现,扩大了民族文学研究的学术范围。

另外,该时段对于民族文学史的宏观观照也提升了刊物的学术性。1994年第1期“文学史建设”专栏刊发邓敏文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建设历程》,该文细致梳理了民族文学史的写作过程,极具史料价值。1994年第3期的“文学史建设”专栏刊发黄修己的《谈我国少数民族现代文学史的编纂》,从史学角度研究了民族文学史编撰及现代文学史中少数民族文学

① 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74页。

② 《〈民族文学研究〉编委会改组并召开编委会工作会议》,《民族文学研究》1994年第4期。



的书写问题,占有资料丰富,对问题的分析鞭辟入里,对研究对象的评价也朴素中肯,显示了研究者扎实的学术功底。

### 新世纪:多元化时代的学术空间拓展

进入新世纪,《民族文学研究》理论探讨论文不仅学术深度较前大为增加,而且数量也飙升到 120 余篇,是 30 年中最丰产的。究其原因是新世纪的文化语境比较多元,为刊物发展创造了更多机会。首先,信息化的便捷带来了全球资源的共享,国外相关领域的一些研究成果经由翻译渠道引介进来,开阔了刊物的研究视域,丰富了学者的研究方法;其次,商品经济时代的一大特色就是竞争的无处不在,学术研究期刊也面临着严格的考核,如果不能提升学术质量就有可能被从核心期刊目录中淘汰下来。所以,渡过了文化调适期后的《民族文学研究》力争上游,在新世纪迎来了一个渐趋多样化的发展高峰。

将新世纪看做《民族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段并非为了对应社会分期,而是刊物在此时确实转变很大。该刊 2000 年第 4 期“理论探讨与思索”栏目刊发梁庭望的《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之发展》与吕微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研究:国家学术与现代民族国家方案》两文即有此意,梁文总结了新中国民族文学研究 50 年的历程与成就,吕文首度从话语权角度研究民族文学史,使研究具有了宏观研究的视野与学术反省的深度。两文的刊发预兆了刊物在新世纪的深度转变,具体而言,新世纪刊发的理论类文章大致特色如下:

#### (一)跨界研究法得到广泛应用,研究的理论水平有所提高

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西风东渐的文化研究在中国蔚然兴盛,跨学科、跨文化的方法也逐渐被学者们运用于具体的批评实践中,以便将文学从“语言学转向”以来孤立的内部研究拉向深入社会、文化的外部研究,“文化批评把学术视野投向了经济、社会、文化的广阔领域,并与经济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哲学政治、社会心理等紧密地联系起来。而且作为一种批评方法与理论,文化批评也有助于消弭学术研究与社会公共领域日趋显露的隔阂与疏离,促使人文研究者关注并介入公共性的社会与政治领域。”<sup>①</sup>

《民族文学研究》理论论文在新世纪的趋向之一就是用文化研究的视野与方法分析民族文学研究、民族文学史运作背后的社会意义。中国民族文学学科诞生的现代民族-国家背景、民族文学史书写的意识形态操控等文化问题相继被研究者提出。如吕微先后于 2000 年第 4 期、2001 年第 1 期发表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研究:国家学术与现代民族国家方案》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中的学科问题与现代性意识形态》两文,分析了民族文学史的国家学

<sup>①</sup> 危磊:《文化批评的发展演进及其在中国语境之运用》,《南方文坛》2011 年第 4 期。

术属性及现代性意识,指出民族文学史书写“在多数情况下是反映国家意识形态的政党、政府规划与反映民族自我意识的集体幻想,以及反映学者个人见解的具体写作相结合的产物。”<sup>①</sup>后殖民理论的文化批判性在其他研究者反思民族文学学科及研究状况的文章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正如刘大先所言,“把后殖民理论运用到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上,关键在于把握它对于现存某些陈旧意识形态、僵化的思维方式或平板的学术氛围的突破、颠覆意识,而不只是一些具体命题或只言片语的论断。”<sup>②</sup>

突破学科边界的文化人类学、文化地理学研究方法因适于阐释少数民族文化,故也为研究者所用。1997年11月首届文学人类学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召开,处于文学、人类学交叉点的少数民族文学受到关注,后陆续有学者从人类学视角阐释民族文学;至2005年5月第二届文学人类学会召开后,《民族文学研究》上刊发的文学人类学方面的理论探讨论文已成气候,2000年至2013年共发20篇左右,叶舒宪、徐新建等力倡文学人类学的知名学者都曾撰稿。文化地理学方法的运用在杨义、刘大先的文章中比较明显。杨义曾提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理念,突出的就是文学的空间文化特征,他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与西南少数民族》(2012年第1期)里提出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的“太极推移”原理及西南少数民族“剪刀形”迁徙路线的文化功能,用以实践自己的文学地图观。刘大先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空间话语》(2011年第4期)中从文化场域、想象空间、异度空间等几个方面阐释了文化地理学空间理论观照下的民族文学。

比较《民族文学研究》30年间理论探讨类论文的差异,可以发现初创期刊发的文章相对单一、粗疏。1990年代出现了一些具有学术规范性的论文,但是这些论文中做得扎实的也还停在史料研究的层面,其研究方法基本仍局限于社会、历史批评法,批评话语的更新滞后于主流学界。直到新世纪,刊物才实现了批评话语的更新,随着文化研究、文化人类学、文化地理学等跨界方法的介入和研究者的代际更新,民族文学研究的理论深度逐渐提高。这种提高一方面表现在开始从宏观层面对民族文学研究和民族文学史生产进行学术反思;一方面表现在从政治经济、社会心理、民族文化、地理空间等多个角度运用多种理论对研究对象做严谨的学术剖析。

## (二)具有文明主体自觉意味的“创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笔谈”专栏形成影响

自2007年第2期开始,《民族文学研究》开设“创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笔谈”栏目,至2009年第三期止,共刊发39篇笔谈论文。笔谈的意旨是针对中国当前文学史书写中少数

① 吕微:《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研究:国家学术与现代民族国家方案》,《民族文学研究》2000年第4期。

② 刘大先:《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反思与重建》,《文艺理论研究》2005年第2期。

民族文学总体缺席的状况,提出文学史书写应包含中华各民族文学事实的整体文学史观。<sup>①</sup> 笔谈主张人关纪新认为将放逐了少数民族历史、文学的汉民族著述冠之以“中国”之名,实质上“显现着文化强势话语对文化弱势话语的轻蔑和压抑。”<sup>②</sup>2007 年第 2 期徐新建在《“多民族文学史观”简论》中提出客观理解少数民族文学在整体的中国文学中的地位,也是中国文学的“史学史”的一个议题。其他论文也从不同角度发表了各自的见解。整体而言,笔谈对中国文学史中民族文学的缺失及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理想前景论述较多,而对于民族文学入史的具体方案设计较少,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实践的局限,客观而言,也是因为就民族文学的边缘化处境来说,“多民族文学史”的落实是一条异常艰巨而漫长的路。

“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笔谈在民族文学研究界也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如《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08 年时刊名仍是《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后更名)先后于 2008 年第 3 期与 2011 年第 1 期各刊发三篇论文参与对“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讨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也于 2008 年第 2 期刊发两篇文章做出回应;大连民族学院的李晓峰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及相关问题研究”于 2007 年获准立项,课题结项后被评为国家社科基金优秀成果,他与刘大先合著的同名专著于 2012 年出版。

将“创建‘多民族文学史观’笔谈”栏目与创刊之初的“少数民族文学史笔谈”栏目比较,会发现此次笔谈具有浓郁的文明主体自觉意味,是“少数民族文学主体的觉醒”。<sup>③</sup>少数民族文学史笔谈是在中宣部的指令下集体进行的,当民族文学史书写成为一项政治任务时,编撰者个人的声音微乎其微。而在众声喧哗的新世纪,学术首先以个人意愿为前提。所以,“创建‘多民族文学史观’笔谈”虽有多人先后参与,但实际仍是由个别学者率先发动,刊物密切配合,其他研究者产生共鸣而后回应的个体学术活动,其中包含着以少数民族族属为主的研究者们对于民族文学处境的自觉思考。这从关纪新(满族)在“多民族文学史观”中发挥的作用即可见出。1994 年关纪新在《社会科学辑刊》第 6 期发表《论各民族文学在互动状态下的多元发展》;1995 年,关纪新、朝戈金合著的《多重选择的世界: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理论描述》在论述少数民族史诗、神话、长篇叙事诗的文学史意义时提出“中国文学史在这几方面的空白,便必

① 应该也包含呼应“中华多民族文学史”的再版、修改工作之意。1997 年,由张炯等主编、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联合编写的十卷本《中华文学通史》问世,各时段体例均吸收少数民族文学,但也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历经十年,少数民族文学与文学研究取得了很多成就。2006 年底,重修《中华文学通史》被提上议事日程,树立多民族文学史观是编写文学史的指导思想。详情参见郎樱《多元一体中华民族文学史的体认与编纂》,《民族文学研究》2007 年第 4 期。

② 关纪新:《创建并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民族文学研究》2007 年第 2 期。

③ 刘大先:《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兴起》,《民族文学研究》2008 年第 4 期。

须靠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现实留存去填补。”<sup>①</sup>故有学者认为：“对多民族文学史的探索，实际在《多重选择的世界》即已开始。”<sup>②</sup>自2004年起，由《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与其他单位联合举办的“多民族文学论坛”逐年召开，推进了“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建设进程，关纪新也一直是其中的中坚。其次，许多学者都曾提到“重写文学史”思潮对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影响。<sup>③</sup>“重写文学史”讨论中并未涉及民族文学，重写的文本中也很少收入民族文学，故而少数民族族属的民族文学研究者们作为本民族的文明主体，怎能没有一种主体意识觉醒后的呼吁呢？

《民族文学研究》是映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一面镜子，虽说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始于1958年，而刊物的创立晚了近30年，但创刊之初的主要工作还是接续中经“文革”停顿的早期少数民族文学史书写，其时的相关零星信息还是可以在创刊初的一些理论探讨论文中觅到端倪的。而对于1983年至今的民族文学研究趋势、内在规律、不足之处，刊物则提供了清晰的轨迹物证，限于篇幅，关于这个问题笔者以后另行论述。如果在横向向度上把《民族文学研究》与当代文坛热点问题及主流期刊联系起来，可以发现《民族文学研究》及其所代表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存在着研究步伐滞后和研究处境孤立的情况。一方面，主流学界出现的重要理论和研究方法及至在《民族文学研究》发生影响，往往已是一段时间之后的事。如“文化转向”之风刮到中国学界基本是在上世纪90年代，影响到《民族文学研究》则已到新世纪；“重写文学史”思潮兴起于1988年，重写的文本在1990年代即陆续面世，《民族文学研究》上与之有一定回应关系的“多民族文学史观”迟至2007年才出现。另一方面，主流期刊较少刊发民族文学研究类论文，《民族文学研究》也较少参与当代文坛热点问题讨论，双方缺乏互动交流，似乎民族文学研究是隔绝于主流文坛之外的另一个领域。当然，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远非一两句话可以说得清楚的。或许什么时候解决了二者的互动问题，民族文学研究走出了边缘化处境，什么时候民族文学研究与主流文学研究才会同步、交融，中国文学研究的多样化格局才会实现，多民族文学史也才会真正落到实处。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贫瘠中的丰饶：西海固文学现象研究”（项目编号：09CZW063）的阶段性成果。

（马梅萍，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生，兰州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刘大先】

① 关纪新、朝戈金：《多重选择的世界：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理论描述》，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页。

② 梁庭望、汪立珍、尹晓琳主编《中国民族文学研究60年》，第68页。

③ 马绍玺：《怎样才能建构真正意义上的多民族的国别文学史》，《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第2期。